

论《实践论》《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

刘丽萍

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摘要：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来，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便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创作于 1937 年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夯实了理论基础、清除了思想障碍、丰富了发展方式，同时也为后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借鉴，由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蓬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实践论》；《矛盾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DOI：10.64216/3080-1494.25.05.048

怎样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学术界一直探讨的焦点，而“两论”即《实践论》和《矛盾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革命实际和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优秀成果三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中的一个典范。关于“两论”的重要价值意义和启示的研究，国内学界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比如：许全兴从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发展、共性与个性的多个角度探讨了“两论”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启示；^[1]陶富源从认识与实践、普遍与特殊两个维度论述了“两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提供的哲学依据；^[2]陈和香提出“两论”是在关注解决现实问题中、是在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及在建构守正创新的哲学范式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的。^[3]这些理论成果都对后续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就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关于“两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贡献的相关研究角度还较为趋同、单一，有待创新、深化。鉴于此，本文从“两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夯实了理论基础、清除了思想障碍、丰富了发展方式这三方面论述“两论”的重要意义。

1 夯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矛盾论》与《实践论》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经典之作，将中国革命实践与传统文化精髓深度融合，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诠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两部著作直击主观主义尤其教条主义的症结，通过剖析中国社会矛盾特殊性与革命实践规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扎根中国大地筑牢理论根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范式与实践路径。

《实践论》系统且生动地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核

心要义，着重强调实践在辩证唯物论认识论中的根本性地位。书中展现认识从感性经验向理性认知升华，再由理性认知反哺实践的螺旋式发展过程，批判了割裂感性与理性联系的两种错误倾向。通过揭示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确立辩证唯物论的知行观，完整继承并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体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构建起坚实的认知理论框架。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中自身的矛盾。”^[4]《矛盾论》紧紧围绕这一点，系统地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矛盾论》开篇就指出了形而上学这种孤立、静止、片面的宇宙观和辩证法这种联系、发展、全面的宇宙观的对立，详细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5]结合具体实际，从辩证法的高度对中国革命中的经验与教训作了总结与升华，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夯实了辩证法基础。

2 清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障碍

毛泽东指出，“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6]在撰写《实践论》《矛盾论》之前，教条主义错误已在党内长期存在，不仅给革命事业带来沉重打击，更引发党内思想的严重混乱。1937 年 7、8 月间，正值中国革命的关键转折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此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亟需依据新的革命态势，制定新的斗争策略，凝聚全民族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毛泽东适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党确

立了抗战时期的政治路线。

然而,王明却从过去的极“左”立场转向极“右”,公然反对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其错误思想的本质,依旧是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产物。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两论”的问世意义深远,不仅有力肃清了党内错误思潮,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扫除了关键的思想障碍。

第一,依托唯物辩证法理论,深刻剖析并驳斥主观主义与形而上学的认知谬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7]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受挫,一个关键因素是党内部分教条主义者盲目照抄苏联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模式。他们对中国特殊的阶级矛盾和实际国情视而不见,没有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是机械地把理论当作公式套用到革命实践中,最终导致革命遭遇重大失败。正如《矛盾论》中指出:“我们的教条主义者不思进取,不愿对具体事物开展任何艰辛的探究,将普遍真理视作无本之木,使其沦为虚无缥缈、难以把握的空洞公式。”^[8]教条主义者罔顾矛盾特殊性,不理解需以差异化方式解决不同矛盾,这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坚守的准则。“他们无视各类革命情形的区别,因而也不明白要用不同方法化解不同矛盾,只是一味用自认为放之四海皆准的公式生搬硬套,最终只能让革命受挫,或把原本顺利的事办砸。”^[9]

第二,秉持能动反映论观点,深入探究主观主义的产生根源。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主观主义的本质根源在于认知路径背离了唯物主义轨道,陷入唯心主义的错误范畴。主观主义者在对待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时,完全违背了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原则,把认识建立在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想象之上,最终造成思维与实践的严重脱节。^[10]毛泽东指出:无论是教条主义还是经验主义,无论是“左”倾冒进抑或右倾保守,主观主义均以主客观分裂、认识与实践脱节为根本特征。^[11]教条主义者将理论与认识割裂于实践之外,使其沦为脱离现实根基的空洞教条和抽象公式。而主观主义滋生的另一根源,在于其对认识过程的机械、形而上学理解。这类思想者未能把握认识螺旋上升的辩证规律,也忽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间的内在关联,最终或陷入片面强调理性的唯理论误区,或滑向依赖经验的经验论泥潭。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理性认识源于感性积累,感性认识需向理性升华。否定前者

将陷入唯心主义误区;固守感性阶段、质疑理性价值,则重蹈“经验论”覆辙。^[12]最后,主观主义者在思考上的主观片面性也导致了他们最终走向了主观主义。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13]

由此可知,《实践论》与《矛盾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为根基,对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批判。通过系统梳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矛盾运动的内在规律,既澄清了革命道路上的思想迷雾,又为制定科学战略提供了方法论指引。这一理论行动,不仅有力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进程,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具体实际的深度融合,扫除了关键的思想阻碍,为革命实践与理论创新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建构提供了实践样本,为党在复杂斗争中把握矛盾转化、制定精准策略筑牢了哲学根基。

3 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现路径

第一、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深度融合。《实践论》和《矛盾论》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根基,但绝非简单照搬。当时中国与俄国国情迥异,俄国工业发展可依靠工人阶级夺取胜利,而中国作为农业大国,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必然行不通。教条主义危害巨大,而毛泽东深谙中国革命实际,早在1928年便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新道路,体现其立足中国视角吸收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成果。此外,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盛行,关键在于无视矛盾特殊性,未能正确运用辩证法原理。《矛盾论》着重凸显对立统一规律作为唯物辩证法根本规律的核心地位,点明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问题是矛盾问题的精髓。^[14]“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奠定哲学基石,成为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有力思想利器。”^[15]同时,对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文化成果相结合。《实践论》融合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认识实践论,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特色,也为传统哲学发展指引方向。《矛盾论》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传统阴阳思想结合,明确“矛盾即对立统一”,改造模糊概念,并强调矛盾转化的条件性,纠正传统辩

证法缺陷,由此构建起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

第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通俗化的语言进行表述。

《实践论》与《矛盾论》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的标杆之作。著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巧妙转化为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思想路线,不仅在当时为我党破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桎梏,更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国内的落地应用。两论篇幅简练却内涵深刻,常以中国百姓耳熟能详的故事为例阐释哲理。这种通俗化、大众化的表达,让抽象的哲学原理变得易于理解,充分彰显了人民性特质,也让哲学真正从理论层面转化为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力量。

4 结语

《实践论》与《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熠熠生辉的里程碑之作,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有着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

理论上,《实践论》以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认识的来源、发展过程以及认识与实践的相互作用。它指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从实践中产生,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强调了“知行合一”,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关于实践与认识辩证关系的原理。《矛盾论》则围绕对立统一规律,全面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等关键内容。在矛盾普遍性的论述上,强调对立统一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而在矛盾特殊性方面,突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重要性,这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贡献卓越。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精华,如“实事求是”“相反相成”等理念相融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注入了独特的中国智慧,使其更具理论深度和文化底蕴。

实践上,“两论”更是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时,教条主义在革命队伍中蔓延,严重阻碍中国革命事业的推进。“两论”的诞生,犹如一盏明灯,通过对教条主义的深刻批判,帮助革命者挣脱了僵化思维的禁锢,树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准则。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依据“两论”蕴含的思想方法,深入剖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矛盾特质与具体状况,才找到了正确的革命路径,推动中国革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如今,加强对《实践论》《矛盾论》的深入研究,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能让我们更透彻地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为破解新时代的各类难题提供科学的思维工具和理论支撑,助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拓展新境界。

参考文献

- [1]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13页。
- [2]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2-298页。
- [3]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9-340页。
- [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9页。
- [5]许全兴:《〈实践论〉和〈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第22-35页。
- [6]陶富源:《〈实践论〉〈矛盾论〉的深远指导意义》,《江淮论坛》2018年第3期,第57-62页。
- [7]陈和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视域下的〈实践论〉〈矛盾论〉》,《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9期,第89-95页。
- [8]李维武:《毛泽东“实践论”的中国性格》,《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第18-30页。
- [9]雍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论〈实践论〉〈矛盾论〉的深远意义》,《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第69-73页。
- [10]雍涛:《〈实践论〉、〈矛盾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哲学研究》2007年第7期,第3-10页。
- [11]刘华初:《从〈实践论〉与〈矛盾论〉看我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4期,第32-38页。
- [12]邱守娟:《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斗争历程的哲学总结——纪念〈实践论〉、〈矛盾论〉发表60周年》,《党的文献》1997年第5期,第37-40页。
- [13]李维武:《毛泽东“实践论”的中国性格》,《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第18-30页。
- [14]高九江,韩琳:《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论〈实践论〉〈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前沿》2013年第3期,第51-53页。

作者简介:刘利萍(2000-),女,汉族,四川泸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